

# 中國文化起源地

鄒 豹 君

(一)研究本題的動機 中外歷史學者及地理專家常說：“黃河流域是中國古代文化起源地。”<sup>(1)</sup>嚴格來看，這種主張與地理事實不盡相符。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氏(A. J. Toynbee)曾進一步解釋。他創出“生活安適有害於文化(Ease is inimical to civilization)”<sup>(2)</sup>的理論。他認為中國古代之黃河流域住民，為了應付黃河流域多水旱之災，能夠善用他們的頭腦，艱苦奮鬥，因而形成中國古代文化。這種似是而非的理論，居然流傳世界，歷多年之久。筆者讀英、美等國地理，並去英、美等國考察，實在找不到湯恩比氏創立這種理論的地理根據。試看英國大不列顛島上文化發展最盛的地區為泰晤士(Thames R.)河流域及奧士(Ouse R.)河流域；其次為麥西(Mersey R.)河流域；特倫特(Trent R.)河流域；恆伯(Humber R.)河流域；提斯(Tees R.)河口；泰因(Tyne R.)河口；克來德(Clyde R.)河口及福斯灣口(Firth of Forth)。在這些流域之內，包括首都倫敦及牛津、劍橋、伯明罕、利物浦、赫爾、格拉斯哥、愛丁堡等著名都市。這些都市地區是否由於地勢平坦，交通便利，住民先能獲得安適的生活，而後始有餘力來動用頭腦，以促進文化？又蘇格蘭北部高地及威爾斯西部山地，經濟不振，文化落後，是否由於那些地區，地勢太崎嶇，交通太困難，物產太缺乏，住民不能夠獲得安適的生活，無暇動用他們的頭腦，以促進兩地區的文化？如果這種解釋正確，那麼“生活安適有害於文化”的主張，真是一種根據薄弱的理論。

美國經濟最發達而且文化最進步的地區是美國東北部，即芝加哥以東，大西洋岸以西，首都華盛頓以北及波士頓以南之長方形地區。這個長方形地區有極進步的文化，也是由於環境優良，生活安適，有餘力來動用頭腦的地方。這些地理事實充分說明“生活安適有利於文化，而非有害於文化”。英、美之學術機構，無一不設

立於通都大邑，交通便利及生活安適之地。反過來說，歐、美各國內，絕無一所大學設立於交通不便而又生活艱苦之地。回頭來看，為甚麼中國古代文化會出現於黃河流域？這是真實的事嗎？如果是真實的事，那麼，中國古代艱苦的地區內會出現文化，而生活安適的地區內，反而不能出現文化，有這種真理嗎？現今世界各國文化地區都有生活安適的地理環境，為甚麼中國古代文化地區偏在生活艱苦的地理環境內？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中國沿海地區為敵軍佔領，人民遷居內陸，生活至為艱苦，已無餘力來發展文化。抗戰勝利後，他們立即離開內陸，回到沿海地區，積極建設文化，獲得迅速發展。這種事實充分說明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是受同一真理來支配。生活安適與交通便利實為發展文化必備的條件。那麼，湯恩比氏為甚麼要創造這一種不合事實的理論？可能由於下列三個因素：(A)他本人從未到過中國黃河流域，因此，他對於黃河流域的地理環境，模糊不清。(B)他本人了解現代的中國人是克勤克儉的民族，他推想古代的中國人也必然是克勤克儉的民族，能夠與艱苦的地理環境奮鬥。(C)他根據歐洲出版不甚精細的中國黃河流域地圖及不甚完備的地理資料，編造出這樣一個似是而非的理論。湯恩比氏是世界著名的歷史學家，而中國學者一向又甚尊重西方學者的理論。因此，湯恩比氏毫無根據的理論，竟為全世界人士所接受。筆者為了追求學術上的真理，不得不切實研究，以求更正這種錯誤的理論。這是筆者研究本文的動機。

(二)研究本題的方法 筆者先提出下列五個小問題，作為研究本題的方法：  
(A)中國古代內，那一個時期可以被選為“文化鼎盛時期”？(B)在已選定的“文化鼎盛時期”內，中國那一地區可以被選為“文化起源地”或“文化搖籃”？(C)已被選定的“文化起源地”是否確實位於黃河流域之內？抑在黃河流域之外？(D)已被選定的“文化起源地”具有甚麼樣的地理環境？它對於當時的住民生活是艱苦？還是安適？(E)如果那個被選定的“文化起源地”確實受到黃河的影響而產生較高的文化，那麼，那個文化起源地在那個時期內所孕育的文化，含有那些特徵，足以反映那個時期黃河的影響？上述五個小問題如果一一獲得解答，本題就不難迎刃而解。

(三)選定那一個時期為中國古代文化鼎盛時期？選定那一地區為中國古代文化起源地？本篇所述的古代，指有史以來的古代，不包括史前時代。因此，本文所述之文化起源地，只限於有史以來的文化起源地。通常所說河南省之仰韶村及山東省之城子崖等地，均為新石器時代內文化遺址，屬於史前時代文化起源地。中國有史文化起源地為安陽，以小屯為中心；其次為鎬京(宗周)及洛陽。中國古代文化鼎盛時期，一般人主張為春秋與戰國。在這一時期內出現了諸子百家。嚴格說來，這一時期應由西曆紀元前六八五年開始，因為這一年正是開創霸業的齊桓公即位的一年。本期止於西曆紀元前二一三年，因為這一年正是秦始皇帝燒詩書及百家語，並設立挾書律的一年。前後歷時共有四七二年之久。這四百多年正是中國古代文化鼎盛時期。在這個文化鼎盛時期內，曾為國際上主要都市的地方，有齊之臨淄(營丘)，晉之曲沃，楚之郢都及秦之咸陽。曾為國際文化中心的地方為魯之曲阜；其次為齊之臨淄。因此，曲阜與臨淄應被選定為中國古代文化鼎盛時期內之文化地區。

從古代都市地理方面來看，安陽是商代首都所在地；鎬京是西周首都所在地；洛陽是東周首都所在地；這三個朝代的首都，都有文字留傳下來。其中對於後世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東周洛陽之李耳(老子)，因為他的思想，對於中國文化的影響，非常深遠。臨淄是齊國首都所在地；曲阜是魯國首都所在地。一般人常稱之“齊魯文化”，就是指春秋及戰國時期內，曲阜與臨淄兩地的文化而言。臨淄是古代軍事重鎮，並為通往東方的咽喉要路。武王封太公望於臨淄，<sup>(3)</sup>其目的使齊國成為周代之東方屏藩，以控制萊人及淮人。後來，管仲採用新經濟政策，提倡捕魚、曬鹽、製鐵、伐木，<sup>(4)</sup>以發展國營事業，<sup>(5)</sup>由是倉廩實而國力足，臨淄也成為春秋時代前期的經濟中心。齊桓公的霸業得能建立起來，正因為他能夠把這個新經濟中心先建立起來，作為他創立霸業的基地。臨淄的文化可以管子一書作為代表。雖然此書不可能是管仲自己寫的，但不失為代表臨淄文化的重要著作。其次為齊人孫武所著的兵法。曲阜是中國史前文化地區之一，也是中國古代文物薈萃之地。傳說中的炎帝之墟。少昊氏曾在此地建立首都。因為這個地方很富庶，又有悠久的文化傳統，武王對這個地方十分重視。他封周公旦於魯，在曲阜建立首都。周公不能親自

去，乃派其子伯禽前往。成王又命魯國得郊祭文王，<sup>(6)</sup>魯國亦享有天子禮樂，文物豐盛，於是成為與鎬京遙對的文化都市。後來，鎬京為犬戎燒燬，曲阜由是成為周代文化中心。由西周初期直至戰國，未受嚴重破壞，文物保存甚富。曲阜的周圍尚有衛、宋、鄭、滕等國，形成一大文化區。出現於本區的重要人物，為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及墨子等。

(四)甚麼叫做流域？以上所述之文化起源地是否全在黃河流域之內？按流域一詞，係指一條河流的集水範圍而言。所謂“黃河流域”，是指黃河幹、支流的集水範圍。雨水流入黃河幹流及其支流的地方纔是黃河流域；雨水不流入黃河幹、支流的地區，不能列入黃河流域。這個理論十分淺顯。安陽在太行山脈東麓，屬於衛河<sup>(7)</sup>流域。衛河東北流，注入運河，與黃河無關。因此，不能把它列入黃河流域之內。曲阜在泰山山地西側，屬於泗水流域。泗水西流注入南陽湖。因此，也不能把它劃在黃河流域之內。臨淄在泰山山地北側，屬於小清河流域。小清河東北流入渤海，也不在黃河流域之內。

西周建國基地在渭河南岸之黃土階地上，古稱為“原”，屬於豐水流域。豐水注入渭河，而渭河又是黃河大支流之一。豐水在黃河流域之邊緣，勉強可以劃入黃河流域之內，但非黃河流域的核心地區。

東周建國基地，在洛陽盆地之內，屬於洛河流域。洛河東北流，注入黃河。因此，洛陽屬於黃河流域。在上述五大文化起源地中，尚無一個地方直接位於黃河幹流兩岸，這一點充分證明五大文化起源地與黃河幹流並無直接關係。五大文化起源地內，只有洛陽一地，位於黃河支流之洛河北岸，而鎬京則位於黃河支流中之支流上，與黃河幹流之關係極微。東周時代最重要的兩大文化中心，曲阜與臨淄，均遠遠離開黃河流域。這是中國古代地理上最具有意義的一個問題。

(五)黃河對於文化的影響在那裏？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其前後，筆者曾到過黃河流域各省，研究黃河兩岸都市所受到黃河的“正面影響”，及其“反面影響”。所謂“正面影響”，包括航運、灌溉、水力及飲水等。所謂“反面影響”，包括妨害兩岸住民的往來及洪水時常氾濫成災等。這次觀察的結果，證實黃河中游地

區內之蘭州、銀川與包頭等都市，均受到黃河的“正面影響”而得到發展。這三個都市直接利用黃河的水灌溉；且利用牛皮筏子從事小規模的航運；蘭州附近黃河南岸設有木製水車，利用水力推動，以發展灌溉。蘭州市區內食用水，也是取自黃河。黃河下游沿岸都市以開封及濟南兩地為最重要。這兩個都市的發展，與黃河均無關係。

開封之成為大都市，實由於趙匡胤把這個地方作為宋代的首都。宋代內黃河，不流經於開封城北，而流經於現今河南省之北境。宋代之開封，實為中國北方大農業地區之中心。開封本為汴水（汜水）流經之地。汴水在元代內始為黃河所奪，變成黃河水道，開封由是接近黃河南岸。換句話說，開封之發展，與黃河毫無關係。現今之開封逐漸衰落，却大部由於黃河水道高出平地後所造成的威脅。開封受到黃河的“反面影響”，非常深刻，但未曾受到黃河的“正面影響”。

濟南在黃河南岸，相距約四哩遠。濟南原來在濟水的南岸。濟水至金代始為黃河所奪，變成黃河水道。<sup>(8)</sup>濟南的發生，由於附近多清泉，屬於泉水聚落。其地距黃河本來甚遠。黃河搶奪濟水之後，始流經濟南之北。由濟南向東北直至渤海，黃河水道完全位於兩岸大堤之內。黃河對於兩岸住民的生活，除“反面影響”外，並無“正面影響”。

（六）如果古代黃河對於古代文化確有“正面影響”，它在文化表現上應當具有那些特徵？古代河流的貢獻，不外食用、灌溉與航運三方面。黃河的水作為食用，只限於蘭州一帶，其他地區並非完全依賴黃河。如果中國古代文化受黃河之賜，那麼，灌溉與航運兩方面之水利工程必然大有進步，水文學亦必有深刻研究。事實上春秋戰國時期內的灌溉，並不在黃河幹流兩岸。<sup>(9)</sup>黃河幹流亦從未作為航運工具。黃河的水文在古代文獻之內，從未提及。這一切可以說明中國古代文化發展，除傳說中大禹治水的故事外，並未含有明顯的黃河色彩。

相反地，中國古代文化為小河流域農業而非大河流域農業。鎬京、洛陽、臨淄與曲阜均可作為這種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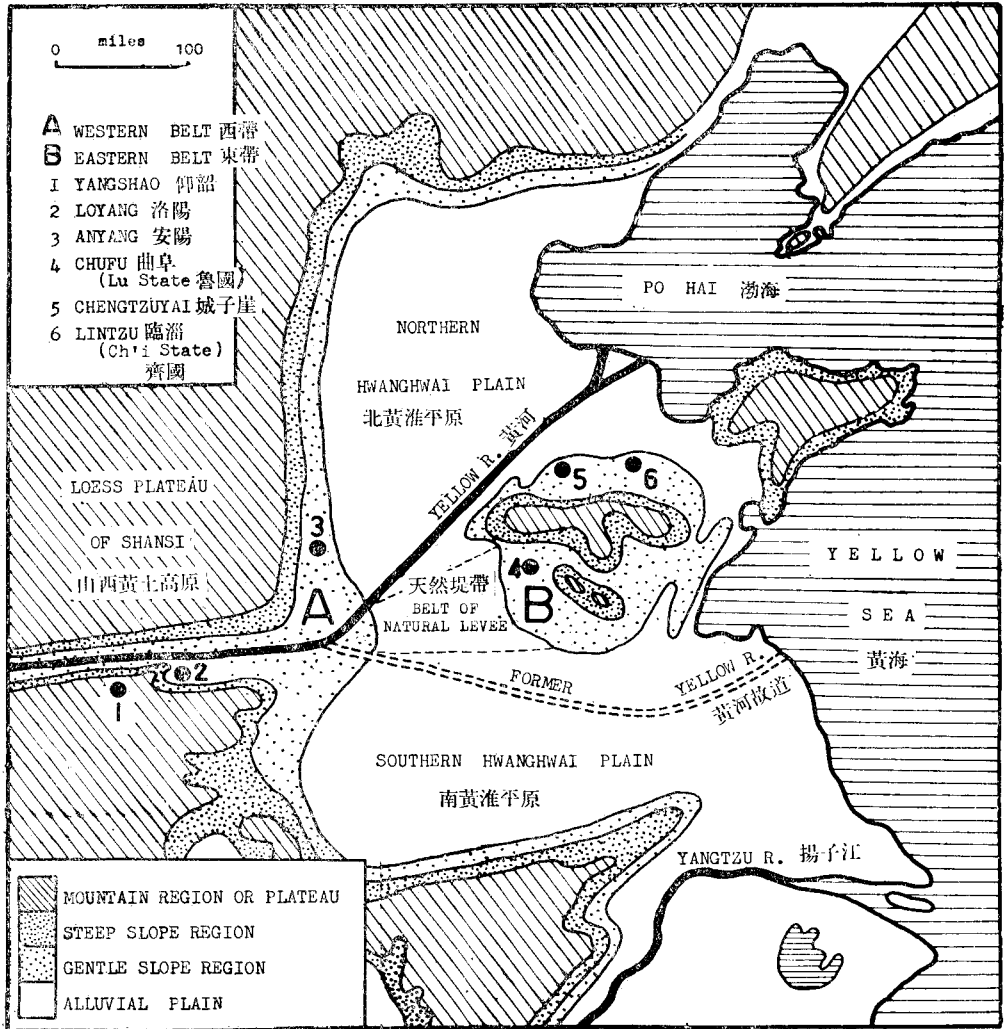
（七）黃淮平原內東西兩側文化起源地 從實地觀察所得，證實黃河幹流對於

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並無直接影響。如果說黃河流域是中國古代文化起源地，真是無稽之談。因為曲阜與臨淄兩地，都不在黃河流域之內。黃河下游水道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一條有南北向擺動的水道。河口最偏北的時期，曾經到達天津的南方；最偏南的時期，曾經到達江蘇省的東岸。這種擺動狀態，很像冲積扇上的水道，呈輻射狀左右擺動。黃河與淮河共同冲積而成的廣大平原，叫做黃淮平原。事實上這個廣大平原的建築師，除了黃河及淮河外，尚有許多小河流；例如沽河、濼河及小清河等。

黃淮平原西側之山麓平原，即太行山脈東坡，本文內叫做“A區”（參閱附圖1）。在A區內的古代文化起源地為商代首都安陽與東周首都洛陽。黃淮平原東側之山麓平原，即泰山山地西側及北側之地，本文內叫做“B區”。在B區內的古代文化起源地為曲阜與臨淄。從文化遺產之多寡而論，B區遠較A區為豐富。B區內包括中國古代許多思想家的誕生地；例如管仲、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孫武子、申不害及晏嬰等。他們的誕生地或在B區之內，或在B區附近。這個B區不僅是中國古代文化起源地，也是世界古代文化起源地之一。從流域方面來看，這個地區屬於許多小河流域，而非大河流域。這一點與通常所說西方文化發展之三大階段（指尼羅河文化、地中海文化及北大西洋文化）截然不同。

(八) A與B兩區的地理環境是艱苦？還是安適？ 從地理環境方面來看，A與B兩區均為山麓平原，在那個時期內，較黃淮平原、汾渭平原及晉陝甘黃土高原好得多。理由有八：第一，A與B兩區都屬於山麓平原，地勢較黃淮平原微高，距黃河幹流又甚遙遠，絕對不受黃河氾濫的影響。第二，這兩區內的排水情形，由於黃河幹流又甚遙遠，絕對不受黃河氾濫的影響。第三，這兩區是冲積黃土，河流把高地上黃土運搬下來，土層鬆軟，土質肥沃，易於發展農業。第四，山麓地區內小河，水質較軟，宜於飲用。黃土高原區內的井水，味苦而澀，不為住民所喜。因此，安陽、鎬京、洛陽、曲阜、臨淄等地均發生在小河附近，是明顯的例證。第五，這兩區由於地勢微高，雨量較多，有天然疏林，出產佳良木材，可作建築之用。黃淮平原與汾渭平原均為氾濫平原，生長茂草，林木稀少。平原內低窪之地，又多沼澤，開發

很困難。在古代內發展農業，山麓平原遠勝於廣大的氾濫平原。第六，黃淮平原及汾渭平原是中國大豆、高粱、粟及桑蠶之原產地。因此，易於發展農業及紡織業。尤其是曲阜一帶正是傳說中之窮桑所在地。第七，在春秋戰國時期內，這些山麓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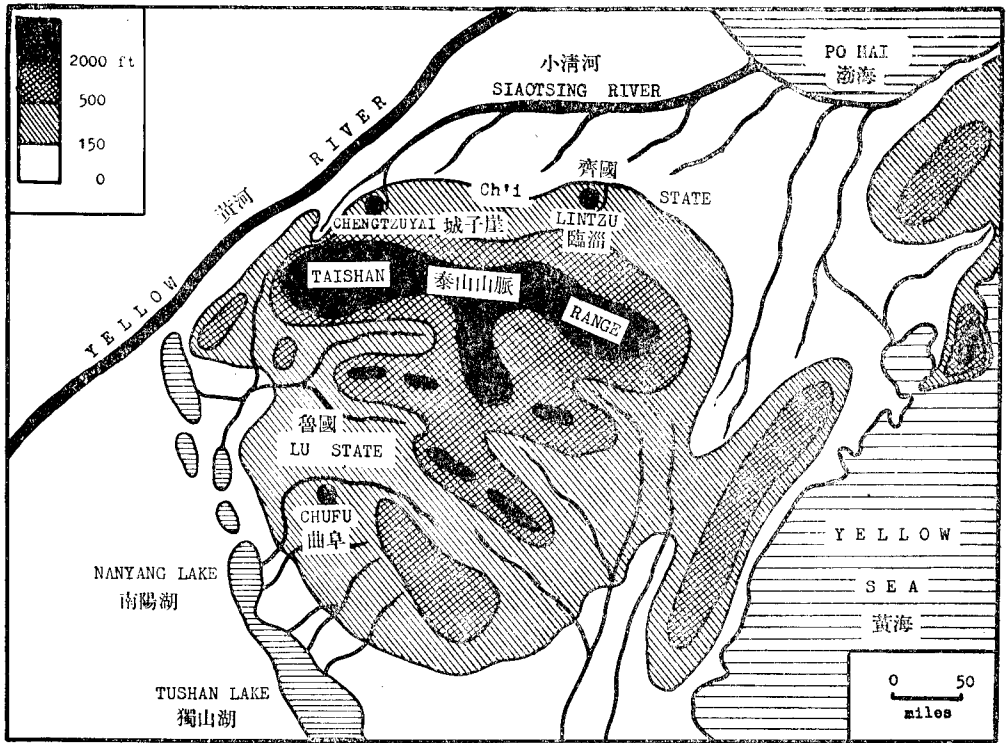


圖一 黃淮平原地勢圖

Fig. 1. Diagram of Parts of the Hwanghwai Plain

原正是重要路線所經之地；例如安陽當太行山脈東麓南北往來要衝；鎭京當秦嶺山脈北麓東西往來要衝；洛陽當潼關走廊東口往來要衝；曲阜當泰山山地西側南北往

來要衝；臨淄當泰山山地北側東西往來要衝。第八，臨淄與曲阜兩地均距黑陶文化中心之城子崖遺址不甚遠；洛陽甚接近彩陶文化中心之仰韶遺址，而商代首都所在地之安陽又直接位於彩陶與黑陶兩文化層遺址之上。這一點可以說明這些文化起源地地理環境的優越性。從這幾方面來看，B區與A區在春秋戰國時期內，正是交通較便利，生活較安適的地區，並非艱苦的地區。這種地理環境，甚有利於發展文化。



圖二 山東高地略圖

Fig. 2. A Sketch Map of the Shantung Highlands

(九)黃淮平原中部的天然堤帶 黃淮平原的西側，以潼關峽谷東口為中心，坡度略向東傾斜，形成大規模半圓狀之沖積扇平原。<sup>(10)</sup> 沖積扇的邊緣略成弧形，北至安陽（商代首都）；東至商邱（周武王封微子於此地）；南至上蔡（戰國時代楚地）。這個沖積扇平原的東端，向東突出，接近泰山山地。沖積扇上的黃河水道在史前時期不斷地南北擺動，沉積而成許多天然堤（natural levee），形成天然堤



帶 (belt of natural levee)。(11) 由於此帶排水佳良，成為A與B兩區文化交流之天然通路。後來，鄭、曹、衛等國均為出現於天然堤帶上的古國。這個天然堤帶甚有助於A與B兩區文化的交流。

(十)中國、埃及與巴比倫三國文化起源地的比較 埃及文化起源地是尼羅河谷。尼羅河不僅適於發展灌溉，且富有航運之利。埃及首都開羅位於尼羅河畔，其發展完全受尼羅河之賜。巴比倫文化起源地是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也是由於此平原內之河流，富有灌溉及航運之利的緣故。巴比倫首都巴格達位於底格里斯河畔，這條河流的影響，竟使巴格達成為世界名城。反觀黃河下游水道，時常遷徙，水災甚多。黃河下游既無灌溉之利，亦無航運之益。如果把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歸功於多災多難的黃河，可以說是“風馬牛不相及”。

(十一)結論 下列五點，作為本文結論。(A)中國有史以來，最早的一個文化地區，在黃淮平原西側，即本文所述之A區。中國有史以來，文化鼎盛時期之文化地區，在黃淮平原東側，即本文所述之B區。(B)以上所述之A與B兩區，除洛陽盆地外，均不在黃河流域之內。因此，中國文化之起源地，不應說是黃河流域。(C)從地形方面來看，中國之古代文化屬於山麓平原文化，或小河流域文化，與埃及、巴比倫等地之屬於氾濫平原文化或大河流域文化，顯然有異。這是東方文化早期發展過程與西方截然不同之點。(D)A與B兩區之文化交流與黃河天然堤帶具有密切關係。(E)湯恩比氏主張“安適有害於文化”。筆者卻認為“安適有利於文化，而非有害於文化”。筆者更認為“安適的條件愈優越，文化之被促進亦愈容易”。換句話說，筆者主張“安適與文化之發展成正比”。

## 參 考 文 獻

1. “中國文明導源於黃河流域”，此語見於黃河志第二編地質誌略之序文，國立編譯館，民國二十四年(1935)。  
 “中國黃河流域，原大而饒，宜畜牧耕稼，有交通之便，於產育初民文化為最適，故能於遠古時即組成一獨立之文化系”。此數語見於梁啓超著，國史研究

六篇飲冰室專集第一節地理，第二頁，中華書局，民國二十五年(1936)。

“夏王朝建築於黃河上游，為高地居民所建之王朝；而商王朝則建築於黃河之下游，為低地居民所建之王朝”。此數語見於錢穆著國史大綱上册第十三頁，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九年(1940)。

2. 湯恩比氏所著之歷史研究 1-4 卷，第八十七至第八十八頁。
3. 司馬遷：史記卷三十二，世家第二，齊太公。齊為周代初期大國，有兩個因素：第一，“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第二，“管蔡作亂，淮夷叛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
4. 史記卷六十二，列傳第二，管晏，“通貨積財，富國強兵”。
5. 黃漢：管子經濟思想，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1936)。
6. 司馬遷：史記，卷三十三，世家第三，魯周公。
7. 安陽附近之河，叫做安陽河，它是衛河上游中一條支流。衛河在周定王五年（西曆紀元前 602 年）前，是否曾注入黃河，現在尚無確證。
8. 宋希尚等著：中國河川誌（一），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國四十三年（1954）。第 31 頁，“金章宗明昌五年（西元 1194 年），黃河循……濟水河道，向東北流，入海”。
9. 司馬遷：史記卷二十九，河渠書，載秦國蜀守李冰，鑿離堆，穿二江，灌溉成都平原；西門豹引漳水灌溉河北平原西部，韓水工鄭國為秦開鑿涇水而灌溉關中平原西北部。這些著名的灌溉區均與黃河幹流無關。
10. G. B. Cressey: Land of the 500 Million, A Geography of China, Mc Graw-Hill, 1955, p. 250.
11. 鄒約君：中國文化發源地為甚麼在黃淮平原，大陸雜誌，第五卷，第八期，民國四十一年(1952)。第 261 頁至第 264 頁。

# THE REGION OF EARLY CHINESE CULTURE

PAO-CHUN TSOU

## INTRODUCTION

The terrain of early Chinese culture presents a problem of supreme interest, both historically and geographically. From the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the question must be asked, how many phases of early Chinese culture successively occurred and which one among these phases flowered most fully? Geographically there must be an examination to find out where the most fully flowering phase of early Chinese culture occurred and what we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on which favoured development in that region.

Early Chinese culture may be divided into four successive phases: the Yang Shao and the Lung Shan, both belonging to the late Neolithic culture in China, and the Shang and the Chou, both part of the early historical culture in China. The Yang Shao culture possesses the well-known painted pottery and the Lung Shan the black pottery. The type site is at Yang Shao in the Western Honan Hilly region and that of Lung Shan is on the north-western side of the Shantung highlands. According to Anderson's study, the Yang Shao culture has been identified as one of the Central Asiatic origin; but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recent research suggests that it may have originated in Honan province and spread westward to Kansu province. All four phases occurred in the marginal belts of the central Hwang-Hwai plain, the so-called North China plain; no doubt the west and east marginal belts of this plain were favourable areas for the stimul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culture.

## TWO MARGINAL BELTS

Topographically, the west marginal belt of the central Hwang-Hwai plain (See Fig. I) is not a broad deltaic plain, but a giant, longitudinal, compound alluvial fan, deposited by the Hwang-ho (the Yellow River) and its affluents. This belt surrounds the eastern sides of the Shansi plateau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Western Honan hilly region on the other. In the lower part of this marginal belt lie the sites of the capitals of the dynasties of Shang and Eastern Chou; and in the upper lie the sites of the Yang Shao Culture. None of these sites lies close to either bank of the Hwang-ho in contrast to the sites of Cairo and Baghdad, the former being situated on the

right bank of the lower channel of the Nile in Egypt, and the latter on both sides of the middle Tigris in Iraq. It is clear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culture bore no relationship either to the channel of the Hwang-ho, or to the adjacent flood plain on each side, except for a number of the affluents of lower Hwang-ho.

The east marginal belt (See Fig. 2) is a semi-circular broad zone of compound alluvial fan, deposited by numerous streams flowing down from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Shantung highlands. In the lower part of this belt lie the sites of the capitals of the states of Ch'i and Lu, culturally the most important feudal principalities in the Chou dynasty. In the upper part lie the sites of the Lung Shan culture. None of these sites is far from the channel of the Hwang-ho, but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relate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culture to the channel of the Hwang-ho. The river was not navigable at any season at that time. In winter, it was either frozen or choked with floating ice, and in the spring the melting ice occasionally produced floods in the lower channel. There were many swamps on both sides of the Hwang-ho in the central Hwang-Hwai Plain during the pre-Chou period. Thus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f the lower Hwang-ho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Nile and the Tigris.

### POSITIVE FACTORS

In general each of these marginal belts possesse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favour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st fully flowering phase of early Chinese culture. Firstly, in terms of their geographical situation, both belts were immune from the floods of the lower Hwang-ho. Secondly, both had adequate rainfall, good drainage, very fertile soils of loessial alluvium, and park-like landscapes. Each month from May to September had an average temperature above 70°F. with the thermometer often rising to 90°F. Winters, in contrast, were very cold, with average temperatures falling below freezing point for one or two months, and with the thermometer occasionally falling to 20°F. at night especially after days of modified cold, dry Siberian air masses, Polar continental in origin (cPu), pushing southwards into the Hwang-Hwai plain. With conditions during the four seasons being so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the weather must have had an exhilarating and revitalizing effect on the inhabitants of the region. Thirdly, the crops that 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mitive agriculture of these two belts, kaoliang, millet, and soya-beans, were all aboriginal plants in the Hwang-Hwai plain. Fourthly, the well water in the region of alluvial fans mentioned above had no bitter taste, while there is some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the inhabitants could get better fresh water for drinking from streams adjacent to these

two marginal belts. The sites of the Lung Shan culture and of the capitals of the dynasties of Shang and Eastern Chou, as well as those of the states of Lu and Ch'i, are all close to an affluent of a small river, but most places of the primary loessland (the Yellow Plateau) had well water of bitter taste.

The Eastern Chou dynasty was the most fully flowering phase of early Chinese culture. Geographically, the eastern marginal belt was much better than the western belt, in which were situated the capitals of the dynasties of Shang and Eastern Chou. It was not only the cradle of silkworm-farming in early China but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area in the Eastern Chou dynasty for producing salt and iron. The terrain of the Lu state on the western side of the Shantung highlands was the most famous silkworm-farming region in early China, and that of the Ch'i state on the northern side of the Shantung highlands was the chief salt- and iron-producing region. Between the two marginal belts lies the central flooded Hwang-Hwai plain, athwart which there is a broad belt of low water-divide, made of resorted loessial alluvium. This broad belt is geomorphologically a zone of compound natural levees, linking the two marginal belts and thus forming a wide bridge through which the cultures of the two marginal belts mingled with one another. It is for these reasons that the zone played such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culture.

### CONCLUSION

(1) The culture of the eastern marginal belt during the Eastern Chou period was really the most fully flowering phase of early China, and this belt can rightly claim to be the cradle of early Chinese culture, because it possesses the birthplaces of Confucius, Mencius, Lao-tzu, Chuang-tzu, Mo-tzu, and many other great Chinese scholars.

(2) This cradle region was at that time the most fully flowering area in early China. These facts, in my opinion, establish the truth that an environment of "ease" is favourab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culture. The stimulus towards culture grows stronger in proportion as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cluding both physical and human aspects grows more favourable. While this opinion is quite contrary to Professor Arnold Toynbee's view that "ease is inimical to civilization", the fact remains that the rise of early Chinese culture was not in a region of special difficulties but clearly at that time in a region of special advantages.